

试析“三个如何”之如何

袁 丁

最近,《当代中国》丛书图书馆事业卷编委会为其撰稿人组织召开了一个专题讨论会,以便对三十七年来我国图书馆事业发展中各个历史阶段的一些重大事件、会议和重要人物及经验教训等有一个总体把握。我有机会在会上听到不少颇有“见道之言”,对有的问题感到很有兴味,也勾起脑海中积贮已久的许多思考,又有一种愿望想将会上碰撞着的一个尚不成熟的思考赶快写出来,作为一种意见与同行交流。不很谦虚地说,我对本专业并不十分陌生,三十多年的业务实践和编辑实践,尽管鲜有成就,但由于长期在编审的岗位上,职业迫使我不得不经常冥思苦想一些专业理论问题上的难点,翻阅了一些有关的重要书籍,对问题的“症结”所在略有所悟,凭着这点,不妨效“野人献曝”,与同行对个话,也许不为无益。

讨论提纲一连提出九个如何,如:“如何评价建国来图书馆事业发展的成就及建国前的基础?”“如何看待历次政治运动对图书馆事业发展的影响?”“如何看待文革后期(1971)的业务恢复和《中图法》、《汉语主题词表》的编制?”等等。看来是由于撰稿需要对解放后这段图书馆事业发展史进行评价而提出的,其实它们是图书界早已存在的“老大难”问题。在此丛书未编写前,

发研究的一股强大的阻力;以往的科学组织方式和现有决策程序对开发研究也存在课题的制定与下达、研究人员的培养与组织、研究成果的评价与应用等各个环节不利于开发研究的兴起。

面对困难,大家充分意识到自己当前的建设使命。他们一方面决心“从我做起”,

不少有志于从事理论研究工作的图书馆学者曾就其中许多方面不断琢磨着试图解释,但毕竟是讨论多,论证少。通过这次较高层次,特别是亲历目睹者的回顾、讨论、对话,这些问题是否就将迎刃而解,我并不以为然,但使我求解之心更切,并愿更多的人参与讨论,这是我思考的主线。

上述三个“如何”的核心是如何看待政治因素对图书馆事业发展的影响。对于前两个“如何”,一般来说,图书馆是一种社会部门,图书馆的发展不仅与社会思想、社会制度有密切关系,而且与支持图书馆的文化结构和价值观念有密切关系。图书馆事业的发展无疑过去、现在、将来都会受到社会政治的影响和制约,例如中国古代藏书楼与近代中国图书馆固不可同日而语;而与解放后图书馆事业的发展更有天壤之别。任何社会制度的变革必然影响图书馆事业的变革。但文化却总是不可割裂的,即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的解放后的图书馆事业,也要从社会性和阶级性的对立统一着眼来分析,把握我们事业发展的许多现象,如衡量图书馆事业发展的诸要素之一——馆藏,就其总体来讲,终究是几千年来古今中外科学文化发展成果的继续,各种著作虽有其阶级局限性,而在根本上依然有其社会性。忽

为逐步转向开发研究从事理论和方法上准备;另一方面,他们也呼吁图书馆界有关各级管理决策部门、各有关学会协会、各刊物编辑部大力支持开发研究,依靠整个图书馆界的努力,实现图书馆学研究方向的真正转变,求得基础研究、应用研究和发展研究相适应的发展。(并思)

视这种社会性就看不清我们社会主义图书馆事业的整个伟大历史使命。这两个“如何”所不同的是前者要求对图书馆事业存在于两种不同社会制度下的比较评价,而后者则要求评价同一历史时期中因政治气候变化而发生的变化。令人寻思的是第三个“如何”,即“如何看待文革后期业务恢复和〈中图法〉、〈汉语主题词表〉的编制”?看来矛盾在于既须对这两项获奖项目加以肯定,又顾虑它们产生于“文革”后期,它较为典型地反映出对图书馆事业、图书馆学本质特性和规律性看法上存在的一种十分“习惯”的政治倾向性的“潜在意识”。据知,还是在1971年出版工作会议“纪要”提出“图书馆要恢复开馆”时,图书馆接着就安排了〈中图法〉的编制,以后又开始了〈汉语主题词表〉的编制工作,主编馆之一的北京图书馆当时还注重了图书馆界内部功能的整体发挥,开展了全国性的协作编制工作。一般来说,这两项较大的业务工程的上马正可以客观地表明它们在“恢复开馆”中所处的地位,它们既非下达的政治任务,也无政治背景可言。尽管在未明确“拨乱反正”之前,参与编制者曾自发地赋予它某些较为明显的“政治色彩”,但这几年不断修订完善工作中的很大一部分工作是针对那些“不必要”的“附加上”去的色彩在进行修正。为了说明这个“不必要”和找出哪些是“附加”在社会主义图书馆图书分类法上的条件,我们不妨粗略地追溯一下图书馆图书分类法的本原,以还其历史发展的本来面目。

我国以学科分类的思想和方法可上溯至汉代以前。现在所提到的几种较大的分类法大都是十九世纪后期以来西方图书馆事业发展的结果,其中,冒号分类法虽然产生于印

度,但也是在美英分类法的影响下诞生,继而对西方图书馆产生了巨大影响的一种。其实,1545年瑞士医生格斯纳博士所编的《万象图书分类表》及《万国书目》应是按学科分类的先驱。此后,自十七世纪至十八世纪末,当牛顿和康德等开始深入研究自然和社会现象,伽利略、培根为科学家开创道路的同时,也开创了一个大有利于图书馆工作的时代。这时人们不仅重视收集图书,而且也研究使用图书知识,认识到图书馆作为学者和科学家实验室的重要性,从而开创了组织知识系统化并使之相互联系的时期;产生了对藏书进行组织编排的热情。于是随着时代的推移、演进和科学的发展,各家分类法应运而生。

从以上简略的追溯可以看出,图书的分类即是知识的分类,所不同的是图书分类虽原本知识之分野,但须兼顾横的演进,而知识分类则是依直线进行的。例如中国的四部分类法因西方学术的传入而发生了重大变化;又如欧洲中古时代盛极一时的神学后来逐渐变成哲学的附庸。但这种发展变化一般都经历了几个世纪甚至几十个世纪,都是随着人类科学文化的发展演变而变化的,是历史的必然,而不是历史瞬间风云变幻。科学完善的分类法是图书馆科学地组织图书的产物。刘国钧先生在他生命的最后时刻曾这样忠实于他的学科说:分类法之于图书馆像辆自行车,是工具,不用它来辨识方向(大意)。多么发人深思的科学思想和明快的语言!

今天,当中央领导同志对理论工作者提出:过去对社会主义的认识附加的东西太多了,要弄清哪些是“附加”的时候,我不揣冒昧,借以发挥一题。